

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网络研究: 以邻避事件为例

康伟^{1,2},曹太鑫²

(1.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2.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对我国社会稳定有序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挖掘群体性事件治理困境并形成学理逻辑,对于提高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优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以81例邻避型群体事件为研究对象,建立事件学习网络,进行网络关键事件识别和网络学习特征分析。研究发现,已发生事件的示范效应对同类事件的发展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更容易被学习;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过程促进了认知固化。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组织学习的有效性、探索政府决策的主动学习路径、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社会学习;学习网络;邻避事件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2)03-0133-08

Study of Social Learning Networks in Mass Incidents: The Example of NIMBY Events

KANG Wei^{1,2}, CAO Taixin²

(1.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ass incidents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stable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ass incidents, the excavation of the dilemma of mass incident governa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doctrinal logic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mass incidents and optimiz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ased o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vent learning network with 81 cases of mass incidents caused by NIMBY and conducts network key event identification and network learning feature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an event that has already occurre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imilar events; event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likely to be learned; the learning process between group events promotes cognitive solidificati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government response to mass incidents, exploring active learning paths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mass incidents; social learning; social learning networks; NIMBY events

收稿日期:2021-09-05 修回日期:2022-02-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邻避危机发展演化机理及协同治理网络研究”(71774038);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城市公共安全的韧性社区评估研究”(LH9G015)。

作者简介:康伟(197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博导,研究方向为城市管理与公共政策、危机管理。

新时期的网络社会背景与多种社会矛盾凸显的风险因素叠加,同时公民的权利意识、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以及政治开放性不断增强,导致各种类型群体性事件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对社会稳定有序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十四五”规划指出,要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因此,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对于政府提高群体性事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关联程度增加,社会记忆得以加强,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和处置结果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一是制度性因素,认为政府决策过程缺乏广泛的公民参与,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二是政治性因素,认为民主政治进程的加快,使得公民追求更广泛的政治权利;三是结构性因素,认为政府决策结果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分配不均。同时,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表现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治理困境,并且在互联网的催化下,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呈现出群体性事件处置结果固化的现象。复杂、动态的外部环境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也造成了公共服务提供不足、政府公信力受损等多输局面。

由于互联网与现实世界交互越来越密切,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不断被上传到网络空间中,从而保留人类在现实世界的行为痕迹^[1]。基于此,互联网能够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进行记录,形成“记忆”进行保存和传播,从而将群体性事件建立认知层面的联系。因此,通过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网络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理解民众及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基础,更好地理解其行为逻辑,从而实现社会精准治理。

一、基于学习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

(一)基于学习视角的多案例的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多案例、多样本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理清群体性事件背后复杂

的因果机制,把握事件动态演化的本质和规律。比较早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是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如向良云(2012)^[2]结合典型群案例,对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升级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变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构建了重大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侯光辉等(2014)^[3]将 2007—2013 年间国内主要邻避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建立邻避事件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朱代琼等(2020)^[4]从个人、环境、行为 3 个方面对 20 个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詹承豫等(2019)^[5]通过对 2003—2017 年共 30 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案例分析探究影响政府采用不同风险沟通方式的关键因素。通过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归因分析,意味着用于研究的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如行为主体、行为特征、发展阶段、影响结果等,从而能够通过多案例比较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的分析、总结归纳,实现知识的学习和新知识的产生。

(二)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研究

“扩散”意味着信息、状态、行为等特征在行为主体之间的同化转移过程。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舆情的扩散,通常认为依托虚拟社交网络平台(如微信、QQ、微博、各类网络论坛等),行动者将自身情绪、认知、行为进行传播和交流^[6],促使个体行为的趋同^[7],激励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和发展^[8-9],如 2011 年的抢盐风波^[10]、2017 年的“雪乡宰客”事件^[11]等。二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动员。通过分析行动网络中的结构和关系,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动员机制^[12]。通过对扩散媒介的分析,研究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动员、技术赋能等扩散路径^[13]。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本质上是为其他行动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示范样本^[14],从而降低其他参与者的参与成本并形成情感和认知的认同,促使集体认同的产生。

(三)危机学习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地方政府进行组织学习是解决治理困境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现有研究中认为政府社会学习主要包括知识体系的认同与维护、依据现有知识对执行策略的调整、风险知识的重塑 3 个层面^[15]。

制度化的社会学习机制能够对政府治理过程进行系统反思,从而有助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16]。随着公众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不断提高^[17]。社会公众通过信息沟通、网络传播等途径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学习,可能会加剧社会公众的非理性认识。因此,政府组织需要通过群体性事件的不同因素进行全面总结学习,从而规避或者降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风险^[18]。面对像邻避冲突中产生的“一闹就停”治理困境,政府与社会公众需要通过社会学习来形成新的共识,推动和优化群体性事件解决路径。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存在社会学习关系,同时互联网为群体性事件中社会学习提供了基础。但现有研究仅通过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结果进行了定性分析,而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具体过程研究较少,对于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结构、社会学习路径等尚不清楚,未解释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事件过程、事件结果、处置措施趋同的问题,如邻避事件体现出的“一闹就停”治理困境。

二、群体性事件中社会学习的理论基础

(一)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会通过关注、观察和模仿角色模范的行为来学习各种行为^[19],并建立起自己的认知架构(如心理结构),从而指导他们模仿这些行为^[20]。Bandura(1977)^[21]将社会学习界定为观察和群体内交流基础上的个人学习,认为学习者与其所处环境间存在重复性互动、学习者改变环境、环境影响学习者的行为。Fiol等(1985)^[22]将其应用于组织研究并形成了组织学习理论。随后,社会学习逐渐被引入到其他学科,并进一步丰富了社会学习的维度,如个体通过观察和与社会环境互动学习、有关社会问题的学习、社会集体的学习、集体决策程序的学习等^[23]。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认知、行为与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社会行为与互联网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人类社会正逐步被映射到网络空间中^[24-25]。当前研究表明,网

络空间的存在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习提供了基础环境。比如说,网络空间中对于身份表达、形成、巩固、维护和谈判提供了公开、自由的场所^[26]。在网页、博客、论坛等社交媒体中,人们通过图标、符号、图像、叙事和话语策略来影响构建自己的身份^[27-28]。同时,在个人身份向集体身份转变方面,博客等社交媒体具有促进作用^[29-30]。这些研究表明,网络空间中的人类行为可以在一定的情景中被模仿和习得^[31]。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数字化的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机器和信息网络进行共享和传播。信息网络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代理机制,扩充了社会学习渠道,提高了社会学习效率,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频繁发生的邻避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动机

网络空间保留了事件的发生过程及结果,从而形成组织记忆。组织记忆是对组织存储的知识与信息以及组织成员获得、存储和提取知识的过程的一种隐喻^[32-33]。Moorman等(1998)^[34]将组织记忆分为与行动有关的过程性组织记忆和与事实有关的陈述性组织记忆。一个组织并不能真正记忆,这些显性与隐性的知识是个体记忆在组织状态下的集合体、学习效果的“存储器”,组织中的成员通过组织学习、互动交流、经验分享等方式,是组织中的知识资源不断延伸、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扩充了组织记忆的内容^[35]。组织记忆的存在促进了社会学习过程。目前已有文献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进行了研究,认为公民在集体行动中进行社会学习,群体性事件中的公民集体反思是社会学习的一种表现形式^[17],并且负面的、消极的社会学习机制正在逐步固化,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矛盾的消解和社会风险源头治理目标的实现^[15]。在政府社会治理方面,认为政府应急信息公开叙事机制的固化,使得公众社学习过程受到阻碍。同时,有学者研究发现,当时使用传统媒体时,决策者能够对集体行动进行有效预测;而使用社交媒体时,集体行动不确定性增加,提高了集体行动治理难度^[36]。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学习能够展现群体性事件的学习路径,可能对治理群体性事

件提供帮助。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治理结果被相对完整地保留在网络空间中,并对现实世界产生持续影响。本文以邻避群体性事件为例,通过收集近 10 年邻避事件文献记录,建立群体性事件社会学习网络,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结构、社会学习路径进行分析。

针对邻避事件的收集主要有两条收集路径。一是通过对学术期刊进行检索。众多学者对于邻避冲突进行了大量的归因研究,研究过程提供了大量的邻避事件信息,为构建邻避事件学习网络提供了基础。二是考虑到信息影响范围,本文通过选取国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新闻网站(如百度新闻、腾讯新闻、新华网、人民网、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等),以“年”为单位,对邻避相关新闻进行检索,对发生的邻避事件进行汇总。

(二)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相关事件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筛查从而建立事件之间的学习网络。具体来说,通过检索 A 事件中是否存在 B 事件信息进行判断,从而确定事件之间的学习关系。考虑到事件发生过程以及政府处理时效,本文检索时间为事件发生前 1 个月到事件结束后 2 个月以保证能够充分涵盖事件全过程。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对中泰垃

圾焚烧项目的发生时间为:2014 年 3 月至 5 月,则本文对相应数据的检索时间为:2014 年 2 月至 7 月。

网络关系采用边列表的形式保存,通过 Ucinet 软件转换成矩阵格式,便于进行网络分析。为方便解读,本文对相关事件进行重新编码,最终形成数据库。数据库主要包括邻避事件列表(列出本文使用的所有事件)、事件属性列表(对每个事件的属性进行汇总,包括起止时间、发生地点、事件类型等)、学习网络(邻避事件社会学习网络边列表)。

四、分析结果

(一)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基本特征

本文研究共收集 81 例邻避事件,涉及 20 个省份。其中,广东省有 14 例、上海市有 11 例、浙江省有 9 例、北京市有 8 例、江苏省有 8 例、其他省份有 1~4 例不等。本文按照邻避设施属性,将邻避设施分为 4 类,分别为污染类、心理类、风险聚集类和化工类。其中,污染类案例为 47 例,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厂、道路交通等设施;化工类为 15 例,主要为 PX 项目、电池厂等化工厂;心理类为 11 例,主要为养老院、殡仪馆等设施;风险聚集类为 8 例,主要为核电厂、核废料处理场等设施。

将邻避事件作为网络节点,事件之间的学习关系视为网络节点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非对称社群矩阵,利用 Ucinet 6 软件对邻避事件学习网络进行可视化得到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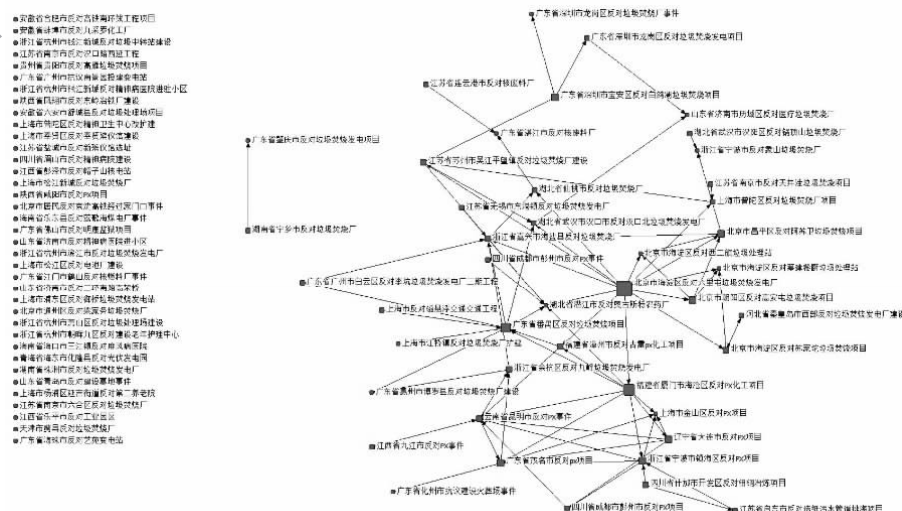


图 1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

网络粘性是指网络中节点间彼此行为的影响力及节点的凝聚力,具体可以通过网络密度和网络平均距离以及网络的聚类系数来说明。具体来看,邻避事件学习网络中共有 81 个节点,共有 77 对主体之间存在学习关系。整体网络密度为 0.012,节点之间联系较为稀疏。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为 2.164,意味着学习网络中的各个事件只有通过 2~4 个事件才能建立联系,事件之间的学习关系存在一定的限制。同时网络聚类系数为 0.075,整体网络凝聚力较低,见表 1。

表 1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网络粘性测度结果

网络	指标				
	节点数 (Nodes)	连线数 (Lines)	密度 (Density)	平均距离 (Distance)	聚类系数 (Clustering Coefficient)
学习网络	81	77	0.012	2.164	0.075

(二)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关键事件识别

对于网络的中心度进行测度能发现不同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通过对邻避事件学习网络形成的网络进行测度,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到,“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浙

表 2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中心度测量结果(前 10)

点度中心度	紧密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反对垃圾焚烧厂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对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
福建省漳州市反对古雷 PX 化工项目	广东省番禺区反对垃圾焚烧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反对 PX 事件
安徽省合肥市反对高铁南环线工程项目	辽宁省大连市反对 PX 项目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反对垃圾焚烧项目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反对 PX 事件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反对 PX 项目	广东省茂名市反对 PX 项目
安徽省蚌埠市反对九采罗化工厂	北京市朝阳区反对高安屯垃圾焚烧项目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反对 PX 项目
上海市反对磁悬浮交通工程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反对白鹤湖垃圾焚烧项目	湖北省仙桃市反对垃圾焚烧厂
江苏省南京市反对天井洼垃圾焚烧项目	北京市昌平区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反对高安屯垃圾焚烧项目	广东省茂名市反对 PX 项目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平望镇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
上海市普陀区反对垃圾焚烧厂项目	福建省漳州市反对古雷 PX 化工项目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市反对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

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反对垃圾焚烧厂”“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对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4 个节点的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在整个学习网络中较高,表明这 4 个事件在整个学习网络中影响力较大,同时网民对其他事件进行检索有更高的可能接触到这四个事件。其中,“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和“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项目”在整个网络中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度和紧密中心度,说明在整体网络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在整体研究中发现,这两个节点对于中国邻避事件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学习特征

任何空间网络都是由不同属性的核心区和边缘区构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网络各节点相互联系,形成内紧外松的网络结构。核心区各节点间联系较为紧密,而处于边缘地区节点间联系则比较稀疏^[37]。如表 3 所示,从测度结果来看,“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京市朝阳区反对高安屯垃圾焚烧项目”“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四川省什邡市开发区反对钨铜冶炼项目”等事件对于学习网络影响较大。随着影响不断加深,对于邻避事件进程和结果产生影响。

表 3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测度

事件名称	核心度
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0.68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	0.511
辽宁省大连市反对 PX 项目	0.186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反对 PX 项目	0.186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反对垃圾焚烧项目	0.175
福建省漳州市反对古雷 PX 化工项目	0.167
四川省什邡市开发区反对钨铜冶炼项目	0.146
云南省昆明市反对 PX 事件	0.116
上海市反对磁悬浮交通工程	0.108
北京市朝阳区反对高安屯垃圾焚烧项目	0.105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示范效应对同类事件的发展过程造成深刻影响。从上述结果来看,“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福建省

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反对 PX 项目”等事件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且因为事件发生时间较早,在新的邻避事件发生过程中,更容易被提及。这意味着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认知方面的连续性,尤其是初始事件的示范效应对后续事件的影响深远,存在类似于社会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会在后续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被反复提及,并以此参与群体性事件行动者的认知形成过程。

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更容易被学习。从凝聚子群测度结果来看,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更容易被学习,主要体现在地区和设施类型特征方面。推测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认知成本和参与成本的降低。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其发生原因、行动主体等类似,更容易被学习。如对于垃圾焚烧厂引起的邻避事件,其原因主要为影响水源、二恶英污染等。不同因垃圾焚烧场建设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中,事件引致原因的类似性,更有可能影响参与者的认知,事件之间的学习概率也会增加,如对垃圾焚烧厂相关事件检索中,“二恶英”会普遍被提及;对 PX 项目相关事件检索中,“PX”会普遍被提及;“环评报告”“信息不对称”等关键词普遍出现在事件总结中。二是工具导向性。由于网络信息查询过程的模糊性,在使用搜索引擎对相关事件进行检索过程中,相同的关键词查询结果会被关联,如用“垃圾焚烧厂”作为关键词,可以同时检索出不同地区垃圾焚烧厂信息。互联网工具通过对同质性内容的推送,能够进一步激励了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

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过程客观形成了认知固化。这种固化效应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的固化,主要包括事件起因趋同、引致因素趋同、事件各阶段的特征趋同等。这种固化特征一方面是由于被学习事件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是当前事件对被学习事件的模仿。二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结果的固化,一方面“照章办事”是目前政府解决民众需求的主要方法,由此出现僵化特征,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不足,形成信息不对称,进而致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

认知存在偏差,出现政府治理失灵现象。另一方面,民众受到被学习事件的影响,期望达到被学习事件的处理结果。通过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所导致的认知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邻避设施建设存在“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治理困境。

(二) 研究贡献

本文通过对样本案例建立事件学习网络,进行网络关键事件识别和网络学习特征分析。研究发现,已发生事件的示范效应对同类事件的发展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更容易被学习;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过程促进了认知固化。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组织学习的有效性、探索政府决策的主动学习路径、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第一,将单次事件拓展为类型事件研究,形成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创新研究视角。本文将应急管理中的单次事件的经验总结拓展成对某一类事件的社会学习。采集相同类型的事件进行研究,提高了群体性事件中组织学习的有效性。相比于按照应急管理级别进行分析,本文提出的学习路径更符合政府和民众学习过程。

第二,探索了群体性事件之间的被动社会学习路径向主动学习转变的路径。目前对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组织学习研究聚焦于事件内学习,并重点关注事件的处置过程。这属于被动学习,而本文将应急管理过程形成闭环,以期能够事前进行主动学习。在治理过程中不仅要选取代表性民众进行充分的实地调研访谈,还要注重网络调研,包括之前发生的类似事件,尤其是当地已经发生的类似事件,以便做好充分的风险分析。本文提供了应急管理中组织学习的方法与路径,能够为政府快速准确锚定学习样本,提炼风险因素,预估民众反应等提供有效指导。

第三,创新应急管理研究方法,优化应急管理流程。通过对群体性事件之间社会学习网络的构建,将应急处理与危机预防进行衔接形成理论闭环,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应急管理流程。采用事

件集对事件特征构建学习网络,与多案例比较、归因等研究方法相比较,更容易发现事件之间的规律,进而提高政府应对和决策效率。

(三)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当前对于防范和化解社会稳定风险要求,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重视对群体性事件案例库的建设,提高利用知识库进行知识挖掘的能力。群体性事件之间的社会学习过程为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认知和实践基础,但同时也为政府进行组织学习提供了有效素材,通过对群体性事件案例库的建设以及对案例库进行深入挖掘,有利于提高政府组织决策效率,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治理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提高政府对群体性事件治理能力。

第二,重视典型事件的示范效应对社会公众认知影响。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过程提示政府组织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终止并不意味着事件影响力的终止,需要通过长时间细致的政策、宣传指导来重塑公众认知。典型事件的示范效应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应对典型群体性事件造成的社会认知偏差进行及时有效纠正,如通过融媒体等方式拓展宣传渠道,同时建立除了通过传统应急管理事件分级外,还应建立事件影响力分级,针对不同影响力事件选择不同的纠正措施。

第三,建立完善知识体系更新制度。群体性事件之间的社会学习过程导致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复杂传递、引导关系。因此,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不应仅关注当前事件的发展过程,还需要对该类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利用群体性事件案例库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并对相关事件处置措施进行比对总结,从而建立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知识体系,并通过制度性措施保障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迭代,以提高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风险因素的感知敏感度,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 (5): 739-768.

[2] 向良云. 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J]. 情报杂志, 2012, 31 (4): 64-69.

[3] 侯光辉, 王元地. 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 11 (3): 80-92, 142.

[4] 朱代琼, 王国华. 突发事件中网民社会情绪产生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的多个案定性比较分析(QCA)[J]. 情报杂志, 2020, 1-10.

[5] 詹承豫, 赵博然. 风险交流还是利益协调: 地方政府社会风险沟通特征研究——基于30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案例分析[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9(1): 1-9.

[6] 彭小兵, 邹晓韵. 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的网络舆情传播机制——基于宁波镇海反PX事件的研究[J]. 情报杂志, 2017, 36(4): 150-155.

[7] 王灿发, 李婷婷. 群体性事件中微博舆论领袖意见的形成、扩散模式及引导策略探讨——以2012年“宁波PX事件”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 35 (3): 148-149.

[8] 虞铭明, 朱德米.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扩散动力学机制分析——以“昆明PX事件”为例[J]. 情报杂志, 2015, 34(8): 115-121.

[9] 王欢, 祝阳.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的放大效应研究——以“微笑局长”事件为例[J]. 现代情报, 2013, 33(4): 78-82.

[10] 张蕾, 郭晓桐. 谣言、信任与群体性事件——基于谣“盐”和抢盐风波的调查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12, 34 (7): 12-18.

[11] 文宏.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导向与政府回应的逻辑互动——基于“雪乡”事件大数据的情感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9(1): 77-90, 127-128.

[12] 朱海龙, 彭鑫. 网络社会人际关系嬗变对政府行动的影响——以扩散性动员为视角[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42(6): 76-82.

[13] 袁潇. 移动网络下集体行动的传播机制研究——基于J市出租车停运事件的个案考察[J]. 当代传播, 2017 (2): 45-46.

[14] 崔凯. 破圈: 粉丝群体爱国主义网络行动的扩散历程——基于对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探讨[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12): 26-49.

[15] 张乐, 童星. “邻避”冲突中的社会学习——基于7个

PX 项目的案例比较[J]. 学术界, 2016(8): 38-54, 325.

[16]李伟权,曹嘉婧. 危机学习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木里县森林火灾的灾后学习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10): 70-78.

[17]崔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邻避抗争:公民在区域治理中的集体行动与社会学习[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3): 167-178.

[18]王郅强,彭睿. 邻避项目如何冲出“一闹就停”的怪圈? ——基于 H 市 Z 区政府“双环危机学习”的纵向案例观察[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 17(2): 141-151, 175.

[19]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

[20]张永军. 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社会学习与社会交换双重视角[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2(12): 23-32.

[21]BANDURA A, WALTERS R H. Social learning theory [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77.

[22]FIOL C M, LYLES M 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5, 10(4): 803-813.

[23]MAARLEVELD M, DABGBÉGNON C. Managing natural resources: 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999, 16(3): 267-280.

[24]LYNCH M. After egypt: the limits and promise of online challenges to the Authoritarian Arab State [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1, 9(2): 301-310.

[25]VALENZUELA S. Unpack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protest behavior: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opinion expression, and activism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3, 57(7): 920-942.

[26]ADEGOJU A, OYEBODE O. Humour as discursive practice in Nigeria's 2015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line campaign discourse[J]. Discourse studies, 2015, 17(6): 643-662.

[27]CHILUWA I. Social media networks and the discourse of resistance: a sociolinguistic Cda of Biafra online discours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2, 23(3): 217-244.

[28]CHOI S, PARK H W. An exploratory approach to a Twitter-based community centered on a political goal in South Korea: who organized it, what they shared, and how they acted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4, 16(1): 129-148.

[29]CHAPMAN H, COFFÉ H. Changing facebook profile pictures as part of a campaign: who does it and why? [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16, 19(4): 483-500.

[30]SOON C, KLUVER R. Uniting political bloggers in diversity: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web activism [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4, 19(3): 500-515.

[31]李明德,杨琳,刘婵君. 网络舆论理性表达及其养成——社会学习理论视角的分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8(5): 129-135.

[32]STEIN E W, ZWASS V. Ac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memory with information systems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5, 6(2): 85-117.

[33]ANAND V, MANZ C C, GLICK W H. An organizational memory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4): 796-809.

[34]MOORMAN C, MINER A S.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emor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4): 698-723.

[35]CONKLIN J. Designing organizational memory: preserving intellectual assets in a knowledge economy [J].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1996, 1: 362.

[36]CHAN M. Media use and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examining the roles of online alternative news and social media news [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7, 94(3): 663-681.

[37]BORGATTI S P, EVERETT M G. Two algorithms for computing regular equivalence [J]. Social networks, 1993, 15(4): 361-376.

(本文责编:海 洋)